

中西文化：异质之神话

[瑞典]罗多弼

詹悦兰 译

—
差异不会让我们无动于衷，它要么引人注目，要么招人排斥。我本人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产生于一种对差异的迷恋以及对扩展自身视野的渴盼之中。

几百年来，对别样的中国文化的强烈兴趣一直是欧洲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自从16世纪末第一批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以后，在欧洲的中国形象就像一个钟摆那样，在理想化与妖魔化之间来回摆动。

伏尔泰声称中国是一个由哲学家统治的国家，在这个国度里，智慧与理智盛行，而且他希望看到在欧洲也有中国的“传教士”散布中国文化的福音。进入现代，很多欧洲人认为在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及毛泽东思想中包藏着西方世界诸问题的解决方案。

这些对异域中国的正面构想同黑格爾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他认为在历史上，“世界精神”(Weltgeist)早就离开了中国而到达了普鲁士，这种“世界精神”其自身在暴政中没有能力发生变化。远早于黑格爾，东方专制主义的观念业已根深蒂固。在现代，这种思想最有影响力的表现形式可能要数1957年卡尔·A·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在其鸿篇巨著《东方专制主义》中所传达的了。

在瑞典历史上，中国的形象，特别是作为一个赶超的榜样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1772年10月28日，18世纪瑞典的一位重要官员同时也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亲华人士卡尔·弗雷德里克·舍费尔先生在斯德哥尔摩的科学研究院前发表了如下的演说：

鉴于那些所谓的有教养、有德行的欧罗巴民族所面临的窘境，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我们的法律与习俗所有的变化历程中，那些变化本身就包藏着造成不稳定局面的祸根，而中国人在一种数千年来都巍然不动的政治体制下生活着，这种体制使得华夏疆域成了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强大、人丁最兴旺、物产最富饶的王国。^①

舍费尔先生对中国的理想化想象得益于法国重农主义者的启迪，他要让别人看到，其弟子国王古斯塔夫三世的政策将带来一个理想社会，之前这样的社会只有在中国才实现过。换言之，他娴熟地利用对中国的理想化描述使其充当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工具，为次年国王的政变开路，也使之有据可循，这场政变让国王成了一个被启蒙了的专制君主。

二
司空见惯地，对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构想常常同真实的情况相悖离，有时这种悖离意味着人们对于中国的真正他样性言过其实了。将很多对那个全然别样的中国所进行的构想视为某种希望和敬畏的情感投射而不是一种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描述，这样的看法却是喜人的。

当今一种极端的相对论观点身披后现代主义模糊主题和公式化表述的外衣，质疑着是否还有丝毫的可能去主张对现实的一种阐释比另一种阐释更真实，在这样的情形下，探讨我们对中国的构想与真实中国之间的差别是有问题的。

我想让自己远离这类认识论上的失败主义。的确，不可能最终证实哪种阐释是正确的，但这一事实不能等同于所有的阐释皆为要么正确，要么不正确。特别是这些人——所研究的是一个凭借政治力量使得广为人知的真理被缄默的国家，对他们而言，极端的相对主义看来是不道德的。

如果我们的历史研究沦落为在语言之外触及不到事实的一种语言游戏的话，那么，比如说这些事实——在由希特勒及其走狗发动的种族屠杀中是否确实有六百万犹太人遇难，抑或是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因政治错误是否真的导致了巨大的历史性灾难——都无关紧要了。

但是，对极端相对主义的抵制绝不当滑向一种试图将唯一事实典律化的

^① 喜仁龙(Osvald Sirén),《18世纪瑞典的中国和中国思想》("Kina och den kinesiska tanken i Sverige på 1700-talet")一文,载于Lycnos 1948—1949,第44页。